

“后布什时代”的中东和平：反恐与和平能兼容吗

刘中民

内容提要：反恐优先与和平进程被边缘化的恶性互动，构成了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沉重遗产。因此，建立和维持和平与反恐之间的兼容、平衡关系成为奥巴马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在宏观战略层面，其关键在于美国能否重塑中东的地区战略环境。具体说来，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美国必须重新评估与以色列的关系，改变长期偏袒以色列的战略僵化；必须调整对巴勒斯坦的政策，尤其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哈马斯融入中东和平进程；应致力于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使叙利亚成为中东和平进程和地区安全的建设性角色。在反恐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只有对美国的反恐战略进行全面调整，确保伊拉克局势不会再度恶化，加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同时避免陷入新的战争泥潭，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朗问题，才能配合中东和平进程，实现反恐与和平的兼容。

关键词：美国 中东 和平进程 反恐战略

在2008年底巴以重燃战火之前，安纳波利斯中东和会的召开，伊拉克局势的相对缓和，以色列与哈马斯为期半年的停火协议的达成、黎巴嫩总统“难产”局面的结束，都使中东局势出现了缓慢缓和的积极迹象。此外，在伊朗问题上，美国虽与伊朗继续对峙，但终究没有出现失控的局面。值此之际，人们多认为中东可以在相对缓和与平静中告别2008年，并期待奥巴马对中东政策进行调整，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实现美国中东战略的“回归平衡”(Restoring the Balance)。¹但是,就在12月27日——2008年即将结束的几天前,以色列发动了对加沙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并随后展开地面进攻,巴以再度陷入血腥的暴力冲突之中,世人期待的中东和平变得更加渺茫。

同样是在2008年,塔利班势力和“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卷土重来。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日益成为受恐怖威胁最严重的国家。2007年底贝·布托遇刺成为巴近年来恐怖势力泛滥的高潮。2008年巴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以穆沙拉夫辞职和扎尔达里当选总统为标志,巴政治权力进入重组和转型时期。但就在扎尔达里就任总统之际,伊斯兰堡发生了万豪酒店特大爆炸案。更为严重的是,2008年岁末的孟买恐怖袭击,再度显示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巨大能量,同时也凸显了国际反恐的任重道远。

在此严峻形势下,世界无疑对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充满了期待。就目前中东乱局的严峻态势来看,推进国际反恐与中东和平进程,无疑将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的主要议题,建立和维持和平与反恐之间的兼容—平衡关系也将成为奥巴马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布什中东政策的沉重遗产中,

反恐与和平两个议题一直充满了矛盾紧张关系。

反恐作为布什政府中东战略的优先议题,尤其是在阿富汗反恐战争后而对与恐怖主义并无实质联系的伊拉克发动战争,而后又深陷泥潭、无法撤足,导致了中东和平议题被严重边缘化,其简单逻辑关系是美国中东战略的反恐议题优先及其战略方向错误排斥和弱化了和平议题。

首先,反恐作为布什政府中东战略的优先议题,尤其是在阿富汗反恐战争后而对与恐怖主义并无实质联系的伊拉克发动战争,而后又深陷泥潭、无法撤足,导致了中东和平议题被严重边缘化,其简单逻辑关系是美国中东战略的反恐议题优先及其战略方向错误排斥和弱化了和平议题。

其次,受美国国内强大的犹太院外集团的影响,以及美国视以色列为中东战略资产的战略定位的影响,偏袒以色列构成了美国难以摆脱的战略文化。其重要的消极后果是不仅导致美国的中东战略丧失了灵活性,而且刺激了反美、反以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滋生蔓延,其简单的逻辑关系亦即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战略僵化,既刺激了恐怖主义,也限制了除以色列以外的其他中东力量与美国的反恐合作。

因此,能否实现和平与反恐两大战略主题的兼容,构成了美国新政府中东战略面临的主要挑战,本文试图对此问题

1 Richard N. Haass and Martin S. Indyk, eds, *Restoring the Balance: A Middle East Strategy for the Next President*,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该书是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萨班研究中心(Saban Cente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专家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理查德·哈斯担任该项目的负责人。在这篇长达近300页的研究报告中,主旨思想是全面总结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教训,为新任美国总统的中东战略出谋划策。报告的内容除理查德·哈斯等人从宏观方面全面论述美国中东战略失误和未来战略调整方向外,包括六个具体方面的内容,即伊拉克问题、伊朗问题、核不扩散问题、阿以冲突、经济与政治发展、中东反恐六大主题。

作若干分析与思考。

一、能否重塑中东的地区战略环境?

美国新政府“在中东将面临一系列严重的、复杂的、相互联系的挑战”，诸如伊朗问题、伊拉克局势、真主党和哈马斯的挑战、步履蹒跚的巴以和平进程、美国在中东的信誉危机和影响力的严重下降。新总统需要“启动多样性的政策以应对严峻的挑战，但他很快就会发现时不我待的紧迫。”因此，“美国新总统的中东政策必须重新区分优先次序并调整其方向”，¹必须“超越伊拉克”。²

以色列在美国政府轮替之前发起对加沙的大规模进攻，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考验美国新政府的中东政策。这也正应验了理查德·哈斯所言的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时间紧迫性。如前所述，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无疑应该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优先议题之一，但美国能否再度扮演历史上推动埃以媾和与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那样的关键角色，其关键在于美国能否重塑有利于中东和平进程的地区战略环境。

冷战结束后，苏联影响力在中东的淡出，美国以“仁义之师”发动的解放科威特的海湾战争，都为美国主导中东和平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在此背景下，克林顿确定了“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中东政策，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作出了一系列努力。但在其执政末期，由于美国对阿拉法特领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强烈不满，以及追求任内实现中东和平进程的功利化做法，加之以色列政局变化后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事件的冲击，巴以关系再度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布什当政后，反恐与民主改造构成美国中东战略两大互相联系的目标，伊拉克成为这一战略的试验场。巴以和平进程被置于反恐与民主改造这两个范畴之中，进而被严重边缘化。

2003年后，美国中东政策“一直被伊拉克问题所主导”，³但事实证明，这场代价沉重的战争不仅使美国的战略重心远离了反恐目标，而且酿成恐怖袭击与教派、族群血腥冲突相交织的乱局，“大中东民主计划”也不得不以止步于伊拉克重建而收场。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问题被严重忽视”，“美国在关切和解决这

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无疑应该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优先议题之一，但美国能否再度扮演历史上推动埃以媾和与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那样的关键角色，其关键在于美国能否重塑有利于中东和平进程的地区战略环境。

1 Richard N. Haass and Martin S. Indyk, "A Time for Diplomatic Renewal: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in Richard N. Haass and Martin S. Indyk, eds, *Restoring the Balance: A Middle East Strategy for the Next President*, p.1.

2 Richard N. Haass and Martin Indyk, "Beyond Iraq: A New U.S. Strategy for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Vol.88, January/February, 2009.

3 Richard N. Haass and Martin S. Indyk, "A Time for Diplomatic Renewal: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p.1.

一首要的地区冲突方面几乎毫无作为”，同时也“为伊朗在阿拉伯心脏地带谋求霸权打开了方便之门。”¹

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当前中东地区的战略环境已经严重恶化。“布什政府八年来的战略的确改变了中东，但也使其最终为中东所钳制、所改变，陷入几个方面的战略被动。”²

当前，美国已在道义上失去了在中东的领导能力，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对美国既有所期待，又对其动机和能力表示质疑的矛盾困境。

当前，美国已在道义上失去了在中东的领导能力，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对美国既有所期待，又对其动机和能力表示质疑的矛盾困境。在具体问题上，美国能否实现从伊拉克撤军的同时避免其再度陷入动荡，避免将反恐重点转向阿富汗后再度陷入一个新的战争泥潭；如何处理棘手的伊朗问题尤其是在和平框架内实现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战略目标；如何防范哈马斯、真主党通过叙利亚与伊朗结成反以和反美阵线，尤其是如何改善与伊朗、叙利亚的关系；如何加强南亚和中东结合部的巴基斯坦反恐尤其是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印巴冲突；如何建立关于中东事务的多边国际框架，尤其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欧洲传统盟友与美国的分歧，如何处理与重返中东的俄罗斯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在中东日益增长的作用等方面，都是美国重塑中东地区战略环境不可忽视的因素。

坦反恐尤其是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印巴冲突；如何建立关于中东事务的多边国际框架，尤其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欧洲传统盟友与美国的分歧，如何处理与重返中东的俄罗斯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在中东日益增长的作用等方面，都是美国重塑中东地区战略环境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中东和平进程能否取得突破？

在反恐优先战略下错误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陷入了反恐收效甚微，民主改革计划虎头蛇尾，中东反美主义高涨，国家“软实力”严重受损的困境。因此，通过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切实推动巴勒斯坦及相关问题得到公正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为其反恐战略创造地区环境，更直接关系到美国能否恢复在中东的领导地位。

（一）美国必须摆脱偏袒以色列的战略僵化

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等人在其著作中罗列了以下诸多事实，说明美以关系的特殊性：1976年之后以色列是美国年度直接经济与军事援助的最大接受国，是美国战后援助的最大接受国和唯一不用报告援助用途的接受国；1982年以来，美国否决了32项批评以色列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超过了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总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史上绝无仅有的。因此，与

1 Richard N. Haass and Martin S. Indyk, "A Time for Diplomatic Renewal: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p.4.

2 杨鸿堡：“‘9·11’事件七周年之际看布什的中东战略”，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8-08/29/content_829469.htm。

以色列的关系占据了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位置。他们认为,在冷战后时期,美以特殊关系的消极影响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对以色列始终不渝的支持、以及与此相关的在整个地区扩展民主的努力,激怒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民众,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安全”;“美国的恐怖主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它和以色列的密切关系带来的,而不是相反”;“所谓‘流氓国家’并不对美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只是威胁到美国给以色列的承诺”;“美以关系使美国在处理与地区国家的关系时遇到困难”;“在中东以外,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也影响到美国的声誉”。因此,自海湾战争以后,以色列已经从美国的战略资产变成了战略包袱。在他们看来,美国偏袒和支持以色列的国内政治逻辑,即以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的巨大影响,其最严重的消极后果是:“游说集团已经影响到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成功说服美国领导人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压迫,并把以色列的地区对手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当作敌人。”¹

以上观点确实有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的强烈色彩,同时也有义愤填膺的批判情绪溢于其中。对于美国而言,抛弃以色列和从中东全面抽身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其国家大战略。但是,美国要想在巴以和平进程上有所作为,必须摆脱长期以来对以色列政策形成的战略僵化,摒弃一味偏袒以色列的做法,转而在巴以问题上采取相对平衡的立场,通过劝说与施压的双重手段对以色列施加影响,推动巴以领土划分、耶路撒冷地位、难民回归、叙以戈兰高地等核心问题的解决。

与以色列的关系
占据了美国中东政策
的核心位置。

自海湾战争以
后,以色列已经从美
国的战略资产变成了
战略包袱。

美国要想在巴
以和平进程上有所作
为,必须摆脱长期以
来对以色列政策形成
的战略僵化,摒弃
一味偏袒以色列的做
法,转而在巴以问题
上采取相对平衡的立
场,通过劝说与施压
的双重手段对以色列
施加影响,推动巴以
领土划分、耶路撒冷
地位、难民回归、叙
以戈兰高地等核心问
题的解决。

(二) 美国必须将哈马斯融入中东和平进程

巴内部的分裂即巴民族权力机构与哈马斯分别控制西岸和加沙的局面,尤其是遭到以色列以及美国排斥和封锁的哈马斯组织,继续坚持暴力反以的强硬立场,并不时发动对以色列的自杀性爆炸以及火箭弹袭击,构成了巴以双方实现和解的严重障碍。这固然有哈马斯自身的原因,它此次遭受以色列重创的教训也对其能否进行政策调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抛开哈马斯自身的因素不谈,哈马斯之所以酿成今天的悲剧,其外部原因主要在于:首先,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以色列方面在巴以问题上重归强硬,是

1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斯蒂芬·瓦尔特:《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节译)》,刘波译,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2473>。

导致哈马斯走向极端化的重要原因。1996年3月,哈马斯宣布将放弃暴力活动,在自治区内进行政治斗争。但在内塔尼亚胡出任以总理后,在巴以和谈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致使巴以最后阶段谈判停滞,哈马斯宣布恢复武装斗争。其次,“9·11”事件后,美国、欧盟等宣布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并冻结其财产,以色列

西方对哈马斯的排斥与遏制,巴以双方不断升级的以暴易暴行为恰恰构成了哈马斯赢得民意、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对哈马斯实施了“定点清除”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西方对哈马斯的排斥与遏制,巴以双方不断升级的以暴易暴行为恰恰构成了哈马斯赢得民意、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对此,巴民族权力机构的一官员指出:“在和平环境中,支持哈马斯的人不到5%。但在以色列的镇压下,支持哈马斯的巴勒斯坦人达到95%。”¹再次,在哈马斯于2006年1月赢得大选后,美国提出了承认哈马斯政府的三个条件:拒绝恐怖主义,

承认以色列生存的权利,接受巴以间达成的国际协定。²此后,由于哈马斯拒不接受美国的条件,美国拒不承认哈马斯并与以色列联手,企图孤立并推翻民选的哈马斯政府,激化了巴勒斯坦内部两派的争斗,巴以和平进程再次遭遇挫折。与此同时,美国在对巴政策上依然采取片面支持阿巴斯领导的民族权力机构,加剧了巴内部分裂。在安纳波利斯会议上,哈马斯依然被排除在会议之外,会议达成的文件与决定建立的美巴以三方机制,均没有对哈马斯组织的考虑与安排。

事实表明,不管哈马斯的主张与行为如何激进,美国都必须正视哈马斯的存在,如何将哈马斯纳入和平进程已成为中东和平能否实现的主要瓶颈之一。首先,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必须承认哈马斯的合法地位及其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应有位置。事实表明,孤立、遏制、封锁、打击哈马斯不仅不能迫使其改变立场,而且只能加剧冲突,恶化巴以会谈的环境。其次,美国应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实现哈马斯和以色列的相互承认,为巴以谈判创造条件。最后,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应与国际社会一道,结束巴民族权力机构与哈马斯的分裂状态。

(三) 美国应致力于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推动叙以谈判

“叙利亚是伊朗影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主要管道”,实践证明,布什政府以叙利亚干涉黎巴嫩政治为由孤立和惩罚叙利亚的政策是失败的,³同时也是导致2006年黎以冲突的重要外部因素。⁴因此,改善与叙利亚关系,全面启动叙以谈判,同时通过与伊朗开启谈判,消解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在中东地

1 陈克勤、黄培昭、伊文、倪木:“哈马斯走过20年争议路”,《环球时报》,2009年1月8日。

2 “Press Briefing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tephen Hadley on President’s Trip to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File, May 9, 2008, p.5.

3 Richard N. Haass and Martin S. Indyk, “A Time for Diplomatic Renewal: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pp.18-19.

4 孙德刚:“叙利亚与伊朗准联盟关系浅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6期。

区形成所谓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的现实基础,无疑是美国新政府中东战略必须正视的问题。

首先,美国应放弃敌视叙利亚的政策,全面改善双方关系。但双方关系改善的重要前提在于美国放弃敌视和压制叙利亚的政策,“因为只有叙利亚与美国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它才会放弃与伊朗的结盟。”¹其次,发挥美国盟友土耳其在改善美叙、叙以关系中的作用,同时通过美国与伊朗关系的改善消除叙利亚的顾虑。²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消除叙以双方的不信任,解决戈兰高地问题。其最终目标是以色列归还戈兰高地,而叙利亚承诺保障以色列的边界安全。

改善与叙利亚关系,全面启动叙以谈判,同时通过与伊朗开启谈判,消解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在中东地区形成所谓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的现实基础,无疑是美国新政府中东战略必须正视的问题。

三、美国反恐战略与反恐态势如何发展?

“9·11”以来,反恐优先的美国安全与外交战略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第一,伊拉克战争导致中东和平进程被长期“休眠”,布什任内一首一尾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和安纳波利斯会议均无建树;第二,在2003年战事结束后,伊拉克演变成反美武装恐怖袭击与国内族裔与教派冲突相交织的战争泥沼;第三,布什政府以“支持恐怖主义”为名,将伊朗列为三大“邪恶轴心”之一,并多次扬言军事打击伊朗,使世界一直充满伊朗会不会成为下一场反恐战争对象的忧虑;第四,仓促从阿富汗移师伊拉克的严重“战略失误”,不仅导致“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卷土重来,而且使巴基斯坦已经成为“恐怖主义全球网络的主要中心”,³孟买恐怖袭击的发生导致印巴关系紧张和对峙,使“动荡弧”地带局势更加紧张。奥巴马政府只有对反恐战略进行全面调整,防范伊拉克局势再度恶化,避免在阿富汗陷入新的战争泥潭,同时妥善解决伊朗问题,避免酿成新的反恐战争或地区战争,才能配合中东和平进程,实现反恐与和平的兼容。

奥巴马政府只有对反恐战略进行全面调整,防范伊拉克局势再度恶化,避免在阿富汗陷入新的战争泥潭,同时妥善解决伊朗问题,避免酿成新的反恐战争或地区战争,才能配合中东和平进程,实现反恐与和平的兼容。

1 Richard N. Haass and Martin S. Indyk, "A Time for Diplomatic Renewal: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p.18.

2 Ibid., p.16.

3 Barnett R. Rubin, "Saving Afghanistan", *Foreign Affairs*, Vol.86, January/February, 2007.

（一）在整体上调整美国的反恐战略

首先，放弃“先发制人”与“政权改造”的强力反恐政策，代之以加强中东国家的反恐能力与制度建设。美国反恐问题专家丹尼尔·拜曼、史蒂文·西蒙建议，“应将反恐纳入整体中东战略的一部分，反恐不应再度充当美国中东政策的主驱动轮”；新政府反恐的重点应是加强地区反恐能力建设，强化“失败国家”的制度建设。¹

其次，对中东民主化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重新掌握道德制高点”。理查德·哈斯等人认为布什“民主改造”中东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他们发出了在中东“校正政治改革议程”的呼吁，“在民主问题上，新总统需要在美国利益与价值观方面寻求可持续的平衡，考虑到该地区的不稳定性，美国应该采取支持长期的、渐进性的民主化进程的政策。”以上主张的核心是要缓解布什“民主改造”中东导致的美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紧张的压力。他们认为新总统面临的两项紧迫事宜是：关闭关塔纳摩监狱；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优先议题。更为长期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更为包容的、和平的中东新秩序”。²

最后，美国应重建反恐合作的多边国际框架。约瑟夫·奈就认为，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已经将其软实力浪费殆尽，并提出三点建议以恢复美国的软实力：作出政策调整，在伊拉克寻找一个政治解决的方案；作出更大的努力，促进中东和平进程；与盟友和国际组织进行更紧密的合作。³

（二）避免伊拉克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反恐形势恶性互动

国际社会以及美国的主流舆论均认为，2007年以来伊拉克的总体安全形势趋于好转，但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美学者史蒂芬·彼得尔等人认为，“在安全方面，严峻的挑战依然存在”，尤其是“基地”组织和萨德尔的迈赫迪军仍然有卷土重来的能力；现有的政治进程依然是“十分有限和极其脆弱的”，“分裂的、制度化程度较低的不成熟的政治体制”使政治和解进程异常艰难；美国军事力量增加是伊拉克安全形势好转的原因所在，“新总统最为重要的决策是在何时撤军以及如何撤军”；难民问题、库尔德人问题、伊拉克周边的地区性因素（尤其是

1 Daniel Byman and Steven Simon, "Counterterrorism and U. S. Policy toward the Middle East", in Richard N. Haass and Martin S. Indyk, eds, *Restoring the Balance: A Middle East Strategy for the Next President*, pp.187-216.

2 Richard N. Haass and Martin S. Indyk, "A Time for Diplomatic Renewal: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pp.11-12.

3 Josef S. Nye, Jr., "America Must Regain Its Soft Power", IHT, May 19, 2004, p.8.

伊朗)等问题的处置,¹都是美国新政府在伊拉克面临的挑战。

奥巴马在选举中承诺将在16个月内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并加强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反恐。但美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包括:在总体上必须确保伊拉克局势的相对稳定,避免在反恐战略重点转向阿富汗和阿巴边境地区后,伊拉克再度陷入内战的恶性互动;美在中亚和南亚则面临既增强反恐效果,同时又要避免陷入又一反恐战争泥潭的考验。

(三) 寻求在和平框架下解决伊朗问题

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另一重要遗产是美国与伊朗关系的紧张和对峙,除去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双方的长期对立因素的影响,反恐问题与核问题成为双方对峙的主要因素。伊朗在“9·11”事件后采取了支持国际反恐的立场和实际举措,但美国却一直认为伊朗是“全世界对国家恐怖主义最积极的支持者”,把它列为“十大恐怖主义国家”之首,²并将伊朗列入“邪恶轴心”。2006年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美国所面临的伊朗的威胁比任何别的国家的威胁都大”。³近几年来,美国一方面通过制裁向伊朗施压,另一方面多次扬言通过“先发制人”的打击消除伊朗的核能力并促成其国内的政权更迭。⁴但是,充满讽刺的是,正是美国发动的两场反恐战争铲除了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为伊朗的崛起搬掉了东西两线的地缘政治敌手。受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布什政府根本无法将对伊朗动武付诸实施,相反却在伊朗内贾德总统刚柔相济的外交面前陷入被动境地。针对伊朗核问题,奥巴马认为通过外交手段与伊朗领导人直接接触,比单纯加强制裁更有利于解决伊朗核问题。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新总统基本不会追随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思路。

针对伊朗核问题,奥巴马认为通过外交手段与伊朗领导人直接接触,比单纯加强制裁更有利于解决伊朗核问题。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新总统基本不会追随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思路。

事实上,美国与伊朗双方都存在改善关系的需求,新总统上台将是双方面临的最佳机会。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的内容,通过与伊朗政府的直接接触,改变伊朗的行为方式,即所谓“通往共存之路”(Pathway to Coexistence)将是美国的必然选择。其原因在于军事打击和支持内部变革的方式都无法颠覆伊朗政权,相

1 Stephen Biddle, Michael E. O'hannon, and Kenneth M. Pollack, "The Evolution of Iraq Strategy", in Richard N. Haass and Martin S. Indyk, eds, *Restoring the Balance: A Middle East Strategy for the Next President*, pp.27-58.

2 高祖贵:“布什政府对伊朗政策的分析”,《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第46—47页。

3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06, p.20.

4 "Interview of the Vice President by Richard Wolffe, Newsweek Magazine", For Immediate Release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January 28, 2007, <http://merln.ndu.edu/archivepdf/iraq/WH/20070128.pdf>.

反会刺激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力量的报复，继续通过叙利亚影响哈马斯和真主党破坏阿以和平进程。报告提出美国新总统“应对伊朗政府寻求合法的国家利益予以尊重”。在伊朗核问题上，报告建议应建立类似朝核六方会谈、美国与伊朗直接参与的多边机制。¹可以肯定，奥巴马上台后，在经历伊朗伊斯兰革命30年来的长期对立后，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有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但关键因素取决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美国能否满足伊朗所需要的安全保证，伊朗能否弃核，如何缓和以色列与伊朗的关系，阿以和平进程能否取得进展，都是美国面临的挑战。

1 Suzanne Maloney and Ray Takeyh, "Pathway to Coexistence: A New U. S. Policy toward Iran", in Richard N. Haass and Martin S. Indyk, eds, *Restoring the Balance: A Middle East Strategy for the Next President*, pp.59-92.